

# 绪 论

## 一 “文明规模”与“文明能量”

对人类文明的演变作一种宏观的考察，对个别文明的历史和现时表现作一种恰入其份的评价，尤其是对文明间力量对比的消涨起落作一种深入的探究，不难发现，一个文明的形态要素如宗教、哲学、制度、语言、文字、习俗、服饰、饮食、行为、举止、身势语、建筑样式（尽管物质要素看上去虽只具有表层意义，却无不反映一个文明的深层心理结构）并不那么重要，而该文明的人口规模、疆域规模、经济规模、文化科技创造力、政治整合能力和军事能力则可能重要得多。

不言而喻，上述六个方面与一个文明的价值体系是水乳交融、须臾不可分离的。或者说，包含在一个文明的宗教、哲学中的价值理念是一种极重要的文明成分，也与上述六大要素有至为密切的关系。因为从根本上说，上述六大要素是建立在一个文明的基本价值预设或观念性的“上层建筑”之基础上的，而这些基本价值预设或观念性“上层建筑”又包含在该文明的宗教或哲学思想中。在长时段意义上，一个文明能否生长传衍、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文明在这七个方面的素质的好坏，或其所能支配的精神资源的优劣和物质资源的多寡。这七大要素之间的关系既一定程度地相互独立，又很大程度地相互联系和依赖。近代以前，各文明的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间的联系比近代以后更为紧密，这三者与文化科技创造力的联系也十分紧密，但近代以来，前三者与后者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密切了。

例如近代以前，中国和印度文明都拥有巨大的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但 19 世纪初以来，两个文明的经济规模与它们的人口和疆域规模越来越不相称，它们的文化科技创造力相对于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来说就更不尽人意了，直至近几十年这种情况才所改观。又如，希腊文明虽拥有过很强的文化科技创造力，也拥有过十分强大的军力，甚至拥有过不小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然而在文明层次上（而非在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城邦内）却因各城邦在地理上过于分散，而极其缺乏作为整体的希腊社会的政治整合性，因此也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意义上的疆域规模。希腊人之所以在历史舞台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与缺乏后两种要素是大有干系的。此外，那些虽有相同宗教和相似文化，却未能实现有效政治整合的民族群最好视为文化共同体，如伊斯兰社会。这些民族在形态上虽属于同一文明，但大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却不是个统一的能力实体。因此，如果那些文化相同但政治上未能有效整合的民族群能整合成单一的能力实体，这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文明资源或能力。文化上一致的多个民族在多大程度上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能力实体，或它们在文明层次上的政治整合性是强还是弱，无疑会深刻影响它们的总体能力和未来走势。

在此不妨假定，一个文明或历史文化共同体因其人口、疆域和经济规模而拥有一种狭义的规模。在此基础上，该共同体的文化科技创造力、政治整合性和军事能力等要素又赋予它一种狭义的能力。在该共同体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这种狭义的规模和能力整合为一种内涵更丰富的“规模”，我们姑且称之为“文明规模”。这种意义上的文明规模应当蕴涵着一种类似于现代民族国之“综合国力”的总体性能量，我们暂且称之为“文明能量”。也可以这样表述，文明规模及其所蕴涵的文明能量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基于其基本价值理念，在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以及政治整合性、文化科技创造力和军事能力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总的效应和力量，一种总的质量（这里“质量”一词在物理学意义上使用），一种作用于其他人类共同体的现实实力和潜在能力的集合，或诸要素的结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调动一切能够为其所用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影响其他历史文化共同体。在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时间流程中，一个历

史文化共同体的总表现便是被它的现实力量和潜在能力的集合所决定的。因此，只有在长程历史的意义上，才可以讲一个文明的规模和能量。

考察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所拥有的规模和能量，不能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某一方面的能力来衡量，而必须使用宏观尺度。亚述人、蒙古人的军力曾非常强大，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规模和能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西方固然有很大的规模和能量，其军力在 19 世纪上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这一百年中曾大大超过了其他文明；西方也藉此建立了诸多殖民地或殖民帝国，攫取了美洲、大洋洲的大部分土地，非洲的部分版图现在也仍为其所据有；西方基于更为先进科技的军力，甚至迄于今日也仍然十分强大。然而，这一切并非意味着西方文明的规模和能量相对于其他文明不处在衰落中。<sup>[1]</sup>也应当看到，一个文明的“规模”和“能量”的内涵既很大程度地相互区别，又一定程度地相互重合。

文明规模显然不是单纯的疆域规模，尽管广袤的疆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明资源。文明规模也不是单纯的人口-经济规模，尽管近代以前人口-经济规模是衡量一个文明的总表现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无疑是一种最重要的文明资源。同样的，文明规模中所蕴涵的文明能量，并非单单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整合能力及相应的社会动员能力，尽管这些能力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具有关键性作用。这种意义上的文明能量也不单单是军事能力，尽管军事能力往往是一个文明的总体规模和能力的外在表现，尽管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而言，军事能力往往是一种事关荣辱兴衰乃至生死存亡的重要能力。

例如 13 至 14 世纪蒙古人的军力不可谓不强，其所建立起来的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的疆域不可谓不广，可是诸蒙古汗国须臾间便土崩瓦解了。它们像流星般划过历史的夜空，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亚历山大时代，希腊人的军事能力也不可谓不强，可是他们打败衰落中的波斯人以后，除了将希腊文化播布到西亚和北非广大地区，使之延续了几百年以外，便没有更好的表现（亚历山大死后立即爆发的希腊人内讧持续了近两百年，直至罗马人兴起将他们最后制

服，方才停止)。另一方面，一个文明虽可能拥有巨大的规模和能量，却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将这种规模和能量有效地转换成科技、制度方面的创新能力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军事能力。19世纪初，中国文明不仅在人口规模上为世界之最，其经济规模亦为世界之最，但其科技、制度方面的创新能力和军事能力却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因此及至1840年，西欧一个蕞尔小国就能以少量而有效的兵力发动一场入室打劫式的野蛮战争，将庞大而腐朽的满清帝国打败，并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它身上。

从长程历史的角度评估各文明的表现或其成败得失，价值理念层面上合理要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具备了价值层面的合理要素，一个文明方有可能开出足够大的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当然也可作如是观：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是开出合理价值体系的必要条件，二者互为因果）。政治整合能力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相对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动员能力同样是重要的。具备了这一要素，一个文明要开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便更容易。具备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一个文明在其成长过程中才有可能逐渐形成真正的规模。形成了真正的规模，一个文明才能实现文化的精致化和深刻化，才能更合理、更有效地使用其人力物力资源，才能把数量巨大的个人的能动性和才智严密地整合在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型的能力实体中。只有形成了真正的规模，一个文明方有可能实现广泛而有深度的精神和物质积累，或一种从信仰形态、思维方式、政治-经济制度到文字、文学、艺术、习俗等方方面面的规模性积累。有了这种深厚的积累，一个文明即便衰落了，也能从颓败走向中兴，进一步成长壮大，将其影响所及衍展至前所未有的范围。

有了深厚的精神和物质积累，一个文明便能开出和支配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即便暂时遭受异族征服和统治，最终也能克服其消极影响，待时机成熟，更能将其推翻，同时吸收、利用其物质和文化成果，使其参与到丰富自己的内涵、扩大自己的文明规模的过程中来；拥有了深厚的精神积累，一个文明便能拥有一种深邃的集体记忆，这就使它在异质文明的全盘挑战面前也能表现出足够的自信，有选择地吸纳利用异质要素，同时又不危及自己的同一性；拥有了深厚的精

神和物质积累，一个文明甚至在遭遇异质文明从价值观到制度、器物全面挑战的情况下，也能在批判改造其原有制度、观念和文化要素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亦即，推陈出新，吸纳采用一切于己有利的东西，从而最终走向复兴。在长程历史的意义上，文明规模的一个极重要的内涵和标示，便在于这种深厚的精神和物质积累。

反过来讲，一个人类共同体如果拥有真正的文明规模和能量，它在上述各方面就应当有种种具体表现。如果分析性地从具体的文明要素看问题，则不仅应当看到一个文明的过去表现和现时状态，而且应当看到它所蕴含的有待展开的可能性或有待实现的潜力。如果一个人类共同体仍然处在生长过程中，其文明规模和能量也就仍然处在生长的过程中。这个共同体的总体性的创造能力或其所蕴涵的种种潜在可能性或已经成为现实，或正在成为现实，或需要在未来某一时刻的特定条件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换句话说，一个文明所蕴涵的可能性或潜在能力，往往并非已经表现为该文明正藉以影响其他文明的现实能力。

事实上，一个文明有待实现的可能性往往需要在异质的环境和条件下，甚至在另一些与之几无亲缘关系的人类共同体中，方有可能获得新的成长空间，方有可能在新的因素的参与下，在更大的规模上得到创造性的实现。中国文明几近整体性地移植到日本后，在那里生长、发育、转型成为富于生气的日本文明；源于印度的佛教及相关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得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源于“叙利亚社会”<sup>[2]</sup>的基督教和相应文化成为西方和俄罗斯的主体性宗教和文化；源于叙利亚文明的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沙漠地区（现主要为沙特阿拉伯）萌芽、生长、发育为整个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伊朗、中亚、南亚乃至东南亚部分地区的主体性宗教或重要宗教。简言之，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个文明所蕴涵的有待实现的可能性能转化成另一个文明的结构成分，为该文明的进一步生长作出重要贡献。

## 二 文明要素及相互关系

近代以来，在构建民族国的现代性情境中，西方以外各大文明内

部虽然在主权国家之利益集团的意义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整合性，这些主权国家的绝对军事能力也因之大大加强（尽管相对于西方的军事能力仍然较弱），但以文明为单位的政治整合性却非但未能得到加强，反而因民族国理念的日渐强化而遭到削弱。从长程历史的意义上看，文明层次上的政治整合性或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sup>[3]</sup>内的政治整合性是十分重要的。这一要素会直接影响到该文明的人口、经济甚或疆域规模，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到其生存、传衍和扩展的能力。在长时段意义上，相对于其他文明要素，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是更为重要的文明要素，文明层面的政治整合性也十分重要，而文化科技创造力和军事能力的相对重要性却不如前四者，尽管从根本上说，后两者与前四者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很难分离。

因为，文化科技方面的新意念及其产物虽能暂时加强一个文明作用于其他文明的能力，尤其是其军事能力，但从长远看，新意念却不可能不扩散和传播，不可能不为那些已具有巨大的规模或深厚的精神-物质积累的文明所利用，加强它们的总体能力。相比之下，一个文明的长程历史意义上的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却相对稳定。苏美尔和埃及文明的文化科技创造力不可谓不强，但真正大规模利用了它们的创造成果的，却是后起的文明如希腊、叙利亚文明。同样的，希腊、叙利亚文明的科技文化创造力不可谓不强，但在更大规模上利用了它们的创造成果的，却是后起的伊斯兰、西方、东正教等叙利亚形态文明。事实上，科技文化新意念是不可能不断播散的，不可能不从一个文明转移到另一个文明，而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要从一个文明转移到另一个文明却远非易事。这里，值得注意例外是伊斯兰教进入现阿富汗地区，全盘置换在那里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佛教；进入印度，部分地置换印度教。这种宗教扩张虽可以视为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从一个文明向另一个文明转移，但在文明史上却并非普遍。相比之下，文化科技要素的播布要容易得多。

尽管在长程历史的意义上，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比其他文明要素更重要，但近代以来，在短时段意义上的文明互动中，文化科技创造力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妨首先讨论一下文明的这一要素。一个文明的文化科技创造力不仅与该文明的人口规模，而且与

其政治整合性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卓越的文化科技创造不可能发生在一个人口稀少、且内部社会矛盾此‘社会矛盾’并非指一文明内部主要基于种族、地理因素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如伊斯兰文明内部阿拉伯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冲突）频繁且尖锐的人类共同体中。文化科技创造力与一个文明同其他文明互动的机会多寡也有明显的联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是不可能产生伟大创造的。希腊文明的文化科技成就，以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多个文明如巴比伦、埃及、克里特文明的成就为基础。叙利亚文明的伟大的宗教发明同样与它地处各古代文明如巴比伦、埃及、赫梯、古伊朗、克里特、希腊等文明的交汇点大有干系。当然，如果将文化科技创造力析分为文化与科技两个方面，则两者中科技创造力的涵义比较明确，而文化创造力的所指，则可能有见仁见智的看法。但相比之下，后者可能更为重要，在近代以前的文明互动史上尤其如此。这种创造力不仅表现在具体的文字、习俗、服饰、饮食、行为、举止、建筑样式等方面，更重要地，表现在一个文明的基本价值预设或理念上。

在此不妨作这一假设，一个伟大的文明在其基本价值理念层面必有一些原生性的合理因素在起作用。没有这些合理因素，该文明要有优秀的表现是不可能的，而很可能在其生命的初期便夭折了。作为历史共同体的希腊罗马文明虽成就了伟大功业，却未能传衍至今，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它在价值理念层面未能即时开出足够的合理要素。反过来讲，那些经久不衰、广为播布的文明一定拥有价值层面上的诸多合理因素。其中最根本的，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无论是“内圣”型还是“外圣”型的存在论）根据、基于理性精神、尊重人本身的价值取向，或一种超越种族和民族界限的人道主义精神。形而上层次的合理要素依其本身的势能，必往下展开、落实为的社会、伦理、政治、经济、甚至器物等形而下层次的合理要素。

人道主义精神在其历史展开过程的前期，往往采取“高级宗教”<sup>[4]</sup>的有神论形式。但人既是按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就必然会藉着神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或者说人最终会把自己而非一个外在、超越的神视为终极目的。换言之，历史上一个文明的有神论信念虽

可能十分强劲，现代意义上的神而人的转型却迟早会发生，从有神论观念体系中迟早会开出世俗形态的人道主义。正由于在价值理念层面存在这一最重要的合理要素，一些最古老的文明才得以传衍至今。另一方面 这种最重要的合理要素往往蕴含在所谓‘高级宗教’中 而宗教所涵摄的，显然又不止这一要素，也包括诸多非合理因素，因此汤因比对宗教的“本质”和“非本质连生物”作了区分。他认为 随着文明的演进，人类应当能将这两种东西剥离开来。实际上，各主要文明的价值系统中的人道主义要素与汤因比所谓宗教的“本质”是一回事。当然，人道主义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论域，不同文明对它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相距甚远。无论是西方形态的人道主义还是儒家形态的人道主义，其发生论意义上的究极根据是什么，其在价值论层面上有什么本质内涵，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若要各文明的价值层面抽象出某种最具共通性的“本质”，或要在各文明的价值理念中寻找一种最起码的通约性，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本质”或通约性只可能是那种基于理性的人道主义，尽管这种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会有很大差异。各文明在现代转型中若能最终蜕脱其“非本质连生物”发扬其固有的合理成分 某种普世文明的价值光辉最终便会朗然呈现。反之，一人类群体若缺乏这种根本性的人道主义要素，便不能持久，甚至很快消亡在历史中。如所皆知，古代亚述帝国因穷兵黩武而终致灭绝，在文化上也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公元 13 至 14 世纪诸蒙古汗国的势力曾覆盖了整个中国、朝鲜、中亚、西亚、东欧的大部分，更进逼日本、越南、埃及，但终因其价值理念层面欠缺人道主义要素而很快衰落了；14 至 15 世纪帖木尔帝国的军力不可谓不强，但它穷兵黩武，嗜杀成性，<sup>[5]</sup>因而在历史上亦如过眼烟云，须臾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严格地讲，亚历山大的帝国及其继承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差。亚历山大本人甚至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可哲学毕竟太抽象，对一个社会的受教育阶层虽能产生一定影响，对草根阶层的作用却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希腊人征服西亚和埃及后，会对当地宗教产生浓厚的兴趣），因而希腊人的理论思维虽然异常活跃，这些理论却不能为开出一个统一、持久的希腊国家作贡献，而只能以哲

学要素的形式在另外一些气质迥异的文明形态中，亦即在以叙利亚型宗教为主要内涵的文明中起作用。换句话说，希腊哲学注定只能裨益后起的文明，而对加强其所由产生的文明却几无意义，尽管斯多葛派哲学中的合理要素堪与现代文明相比，其在罗马上层阶级的普及更为基督教的兴起乃至国教化准备了思想土壤。

也需注意，一个文明的政治整合性与其制度创造关系密切。政治整合性的重要性在于，它会直接影响一个文明的总体性动员能力。一个文明也许蕴涵丰富的潜力，但其政治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上的不合理却可能妨碍其潜力的有效发挥。另一文明的潜力可能并非很大，但它能藉着较强的政治整合性所赋予它的动员能力将此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现代史上（尤其是二战前）的中国属于前一种情况，而日本则属于后一种情况。当然，政治整合性与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甚至会压制一个文明的生命力，严重挫伤其创造性。毋宁说，政治整合性应理解为一种健康的政治统一性，或政治权力的一种恰到好处的集中。

在近代以前 中国文明的两汉、唐、宋、清等朝代的前期 希腊文明史上的屋大维、哈德良、马可·奥略留等皇帝统治时期的政治整合性较为接近理想状态。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是，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一个文明的政治整合性都与该文明在其价值预设的框架内所能达到的社会公正程度密切相关。这里，社会公正是长时段意义上的、相对于价值预设框架的社会公正，与该文明的“合理化论证”系统，<sup>[6]</sup>或其宗教-哲学思想及相应的符号系统和组织形式须臾不可分离。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后期，土地无不高度集中在豪强大户手中，社会严重不公，因而有规律地爆发农民起义，而这种起义规模之大，为文明史之最。在此过程中，旧政权被推翻，新政权建立了起来。在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框架内，这种情形不啻是社会资源和机会的一种深刻的、大规模的再分配，一种重新确立社会公正的结构性手段，形象地说，就是牌局中的重新发牌。并非不重要，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使个人能较少凭出身、更多凭才能获得社会地位。与世界上所有文明相比，科举制带来的深刻的社会流动性或社会机遇的再分配，也不失为一种社会公正。

最后，一个文明的军事能力与人口规模的关系也许不那么密切。在长时段意义上，一种强大且相对持久的军事能力与各文明要素的结合所能产生的综合力量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在短时段意义上，军事能力与军事技术和战法上的创新的关系却更紧密。亚历山大时代马其顿人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成为希腊霸主，继而组成希腊联军入侵东方，以少胜多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军队，主要依靠的便是军事技术和战法上的革新。罗马之所以能在几百年内从一个蕞尔小国不断发展壮大，征服意大利，进而控制整个地中海东部，最后扩张到西亚、北非、不列颠、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很大程度上也靠的是军事技术和战法上的创新。<sup>[7]</sup>蒙古人之所以能征服欧亚大陆一片广袤的区域，不仅靠的是游牧生活本身的高度机动性（马匹带来的优势表面上看是战术性的，实则具有战略意义）而且靠的是中国人的技术发明，如火药、火器、技术含量较高的攻城器械，同时还有对掳来的大量中国工匠的利用，换句话说，蒙古人将中国人的先进技术转化成了军事能力。在现代条件下，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所以有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的军事能力，也主要靠的是先进的科技。在这里，正如现代条件下经济实力与人口的关系已非十分密切那样，军事能力与人口的关系亦非十分紧密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虽大大衰退，但它基于先进科技的军事能力却仍能保持仅次于美国，明显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

### 三 “人口规模”的内涵及重要性

近现代以前，一个文明的人口与经济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人口规模通常与经济规模成正比，或一个文明的人口数量越大，其经济规模也越大。据世界银行统计，直至 1830 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在此后一百来年中才逐年下降到较低的水平。<sup>[8]</sup>人口、经济规模又与一个社会的其他方面如科技、政治、思想、文化紧密关联。在前近代农本社会的条件下，只有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生产剩余率才能使工商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才能使政治形态、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发达成为可能，而较发达的农业，又与较

大的人口数量互为条件。由于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近代以前的中国文明“政治之统一、政权形态之发达、作为脑体分工产生的士大夫阶层之发展以及其在科学文化和政权建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之大，都是西欧和其他封建国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sup>[9]</sup>

也是由于拥有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中国很早就有大型藏书楼。11世纪已出现活字印刷，不久大量书籍流传于世。开凿运河和人口增长促使贸易和工业都很发达。中国的城市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分布很广。纸币早已加快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的最后几年，华北已有大规模的炼铁工业，年产量约12.5万吨……上述生产数字远远超过七百年后产业革命早期英国的铁产量。”<sup>[10]</sup>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前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在人口资源比严重失衡的条件下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即使发达的农业文明成为可能，也妨碍了中国的工业化，阻碍了中国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过渡、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过总的说来，在前工业化的文明形态中，人口规模仍不失为一个最重要的文明指标。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人口规模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明规模和总体能力来讲，更是一个基本条件。

以上讨论中的“文化科技创造力”、“政治整合性”和“疆域规模”虽都可能产生歧义，但不会太严重。“人口规模”看似简单，实则内涵复杂得多。一般说来，一人类群体的人口越是增长，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便会变得越复杂，协调人际关系的需要便越迫切，该人类群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也就越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社会政治组织的复杂化将进一步提高该人类群体的总体能力。在存在人口压力的条件下，这意味着这个共同体空间扩张的可能性增大，而空间的扩张又可能导致社会政治组织的进一步复杂化，使其总体能力进一步提高。<sup>[11]</sup>需要导致发展，发展导致进一步的需要——滚雪球效应发生了。较大的人口密度和规模不仅使更复杂的社会政治组织成为可能，也因人际交往的复杂化和频度增高而使一个社群的整体智力得到提高。这就必然增大该人类群体进行文化、科技创新的可能性和能力，人口压力本身也就可能成为创新活动的一种重要动原，因为只有创新，一个社群方有可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改善自身处境，

支配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此外，当一人类群体进入另一文化区域时，人口规模也是它能否在异质环境中成功保持自身同一性，巩固并扩大既有成果的关键。公元前 15 世纪以来雅利安人在印度次大陆的逐步推进并最终站稳脚跟，便说明了这一点。<sup>[12]</sup> 因此，至少就近代以前而言，人口规模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极重要的文明要素，而且是经济规模、疆域规模、政治整合性和文化科技创造力等要素的前提。也不妨说，基于合理价值理念的巨大人口规模一定能转化成深厚、巨大的文明能量。

就大型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或文明产生后的情形而言，人口规模更多应当指具有相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口的数量，或者说以特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界定其身份的人口的数量，而非一个政治体所暂时控制的，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人口的数量。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统治下的人口数量按古代标准不可谓少，但真正认同希腊文化、拥护希腊人统治的人数却少得多。对此，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是有认识的。他们知道，如果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没有大体上一致的文化认同，社会的政治整合性便可能不强，甚至很弱，对征服者的政治认可也将十分有限，希腊人的政治统治便不可能长久。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成熟的政治整合和高度的政治统一必得有文化一体化或同质性之基础；没有起码的文化认同，政治整合便无法加强，持久的政治统一更不可能。事实上，在东征后远非整合的文化-政治格局中，亚历山大出于现实考虑很尊重被征服民族，甚至身体力行，娶波斯人为妻，也让许多手下部将与波斯人通婚，在波斯旧都波塞波利斯上演了一出希腊军人与波斯妇女举行集体婚礼的笑剧。<sup>[13]</sup> 其继承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这样做了。然而，真正的“希腊化”或使希腊文化成为所有民族藉以界定其群体身份的文化，却可能至少需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方可能实现。况且，即使“希腊化”真的发生了，那也极有可能是“化希腊”或被征服者的文化与征服者的文化的融合，甚至是征服者被迫采用被征服者的文化，而非爱琴海地区相对“纯粹”的希腊文化数量上的扩张，更非希腊种族数量上的增长。

亚历山大在埃及的继承者托勒密一世灵活地采用了被征服民族的宗教形式，以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达到某种程度的文化一体化。

“他希望通过将埃及的神俄西里斯-阿匹斯希腊化来获得这种政治上期望得到的效果……这个孟斐斯的埃及神在托勒密的新希腊首都亚历山大里亚的埃及区拉科蒂斯又有了一个新的神殿。在这里，他在赛拉尼斯的名下获得了一种希腊化的外表，既成为托勒密统治下希腊人的崇拜对象，又成为别处希腊人的崇拜对象。”可他未能成功。<sup>[14]</sup>亚历山大的另一个继承者塞琉西皇帝安条克四世也有类似做法。他在其统治地区用行政手段将各地原有的区域神等同于新的帝国神宙斯·奥莱尼奥斯，以期“在自己的形形色色的臣民中建立一种对于帝国的爱国主义情感。”<sup>[15]</sup>他也没有成功。当他企图用新的崇拜形式来取代犹太人的耶和华，即把新的帝国神的标准形象强加给他们，以在多民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信仰一体化时，<sup>[16]</sup>他就更不成功了。这引起了名为“哈斯芒运动”的犹太人的武装抵抗。在此运动中，犹太人大大加强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由此看来，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文明要素，一个文明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规模，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凝聚力的人口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同质性是以地理条件为前提，以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一体化为基础的。具备了基于文化同质性的大量人口与否，是能否支配大量物质-精神资源和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前提，最终也是能否形成文明规模的前提。

## 四 创新能力与非智力素质

首先应认识到，人类文明史上大多数影响深远的创新是在已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次也应承认，创新对于一个文明的成长壮大至关重要。可是对于长时段意义上的文明规模和能量来说，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创新能力固然十分重要，但若因一些重要的文明素质的缺失，创新的成果便不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现实生产和生活中，若这种创新不能被发扬光大，则其对于该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能力的增强来说，便意义有限。如果一个人类共同体拥有精进健动、不屈不挠、忍辱负重、能屈能伸、以柔克刚、勇敢勤劳、实干苦干一类通常并非被视为“创新”的素质，尤其是拥有那种能在更大规模上吸收

利用其他文明‘原创’成果的‘非智力’素质，该共同体便更有可能扩大其规模，增强其能力。

波斯人和希腊人在地中海西亚地区建立的普遍国家虽都未能成大气候，却有一个更成功的文化政治体继承了他们的遗产，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罗马帝国。可是罗马人虽然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绩，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却为后世文明史家所诟病：他们未能表现出足够的文化创造性，或者说，他们有这样一种严重的素质缺陷。英国学者、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克莱夫·贝尔便认为：“罗马人根本就不可能有热烈的爱、深刻的美感、细腻的思想、令人神往的谈吐或诱人的坏毛病。他们根本就领会不到思想感情世界的真象。他们勉强搞出的那点儿文化是在公元 2 世纪搞的，而且纯粹是希腊货色，只不过是少数希腊作家和思想家点缀着那个时代，使它发出一些暗淡的光亮而已。他们这丁点思想简直不可能使罗马帝国这一大块笨东西活跃起来……罗马帝国最伟大、最有益的贡献罗马法就是在 2 世纪才具有我们所熟悉的面貌——当然那时还没有编成法典，那是三百多年以后的事。众所周知，罗马法基本上是希腊的，著名的法理学家无一例外都是（希腊的）斯多葛派，他们按照自己的哲学原理把较古老的罗马原则加以修正、发展。”<sup>[17]</sup>

这种看法在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中是很普遍的。扬希腊、抑罗马的倾向当然与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关，可是许多西方人未能意识到或视而不见的是，希腊人虽然表现出了杰出的文化创造能力，却未能表现出使之持久并在更大规模上使之发扬光大的才能。换句话说，希腊人未能表现出那种看上去平庸，但对充分实现创新所蕴涵的可能性来说更重要的才能。这种才能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明素质。没有这些素质，一个民族或共同体要持久地扮演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形成真正的文明规模，积聚起真正的文明能量，便是不可能的。希腊人虽然在智识活动、艺术创造方面异常聪慧和敏锐，他们甚至极富生活情趣，却缺乏罗马人那种务实精神。离开了这种精神，任何一个文明要垂之久远都不可能。<sup>[18]</sup>波斯人的普遍国家阿黑门尼德王朝虽因类似的难题被赶下了历史舞台，但仍存在了约二百三十年（公元前 559 年至公元前 330 年），恰成对

照的是，由于缺乏实干精神这一重要的文明素质，希腊人建立的普遍国家在襁褓中便夭折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罗马人的确未能表现出足够的文化原创性。因此，一些论者甚至认为独立的罗马文明是不存在的。汤因比就有这种看法，即作为政治、文化实体的罗马国家只是希腊文明的“亚文明”或罗马不过是希腊文明的“普遍国家”阶段。<sup>[19]</sup>这一判断即便有一定道理，“创新”究竟有何内涵也是值得讨论的。现代日本人将自己善于吸收利用其他文明的第一性科技创新成就，将之发扬光大，产生惊人结果这种才能称为“第二创造性”。事实上，在扩大一个文明的规模和总体能量的意义上，所谓“第二性”创造的意义并不亚于第一性创造。从古地中海地区的情况看，罗马人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未能表现出希腊意义上的第一创造性，甚至未能表现出那种“深刻的美感”和“细腻的思想”。如果说他们的确表现出某种创造性那或许只是“第二性”的。然而，在全盘接纳了希腊文明后，他们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将其发扬光大了，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表现出了政治、经济、军事、建筑、工程技术方面的种种非凡才能，而这些都是希腊人所缺乏的素质。

这些具有实际意义的优秀素质所给予罗马人的优势，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他们对地中海西亚地区和西欧许多地区的支配中是不难看出的，尽管在现代人的看来，他们使东方民族沦为名义上的“盟邦”又在“盟邦”几无觉察的情况下将之置于受奴役地位，怎么说也是一种帝国主义行径。<sup>[20]</sup>罗马人的素质也不仅仅表现在他们手中才最终成形和完善的罗马法（当现代人谈到罗马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罗马法）方面，也许更重要地表现在他们卓越的行政和军事才能上。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将多个文明和民族成功地结合到一个巨大且相对统一的政治体中，并持续这么长的时间，<sup>[21]</sup>在古代世界委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此可以说，在长程历史意义上，希腊人的创新能力固然是一种极重要的文明资源，但在文明的进一步演进中却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因为一个文明要形成真正的规模和能量，属于纯智力范畴的能力和一般被视为非智力因素的文明素质是同等重要的。从长远看，精进健动、勇敢勤劳、实干

苦干、坚强的意志等品质更重要。

姑且不论希腊人是否从先前各个文明的成果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以成就其新一轮的文化创造，即便我们承认他们的确拥有不同凡响的创新能力和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和趋势而言，及至一个统一国家呼之欲出的时代，是否具有这种第一性的创新能力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在人类文明总的历程之意义上，不可能也不需要任何时期、任何地点、任何民族中都发生令人激动的第一性创新或“原创”。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文明规模和能量。就中国文明而言，不可能也不需要它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处在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造性亢奋中。在更多情况下，非智力的文明素质是一种更重要的文明资源，因为恰恰是这些素质使一个文明能够不断成长壮大，持之久远。比之古代地中海西亚地区的众多民族，罗马人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东亚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经历同样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假定文明史上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出现文化科技“原创”，那么，在某种形式的创新高潮已过去的情况下，一个共同体此时要把握历史机会，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其非智力素质就比其他时候更重要。罗马人若没有勇敢、实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一类非智力素质，绝对不可能雄踞历史舞台那么久。这里，如果不将罗马人的这些素质考虑在内，便谈不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优秀的文明品质。罗马人这些非智力素质应被视为重要的文明资源，这些资源在希腊人身上要么不存在，要么隐而不显。考虑到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地区的延续，且存在了一千多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还享祚近一千年），罗马人的成就便更引人注目了。<sup>[22]</sup> 如果从公元纪年开始前夕罗马帝国建立算起，则至公元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破，罗马统一国家持续了近一千五百年。同样的，中国人如果没有那种精进健动、不屈不挠、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能屈能伸、以柔克刚等表面上看来并非创新能力的文明品质，中华世界便失去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文明资源，便不可能在如此巨大的规模上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虽然百花其放、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不可否认是一个创新精神极强的时代），便不可能形成那种使它一次又一次从衰落中崛起的文明规模-能量。

相比之下，希腊人虽有过辉煌的文化创造，但他们在刚表现出建立一个大型统一国家的能力时，便被新兴力量取而代之了。希腊人的殖民地曾遍布小亚西部、爱琴海地区、黑海沿岸，以及意大利南部。自相残杀虽是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但在外敌入侵面前，城邦间也能勉强联合起来以夺取暂时胜利，可刚打败敌人或直接威胁刚过去，他们便旧病复发，又在自己中间恶斗起来，这就难免导致半野蛮的马其顿人坐收渔利。比之“正宗”的希腊人如雅典人、斯巴达人、科林斯人和底比斯人，亚历山大这个半希腊化的马其顿国王有高得多的实干才能，不然便不可能征服看上去比希腊人强大得多的波斯帝国。可是由于希腊文明先天性的品质缺陷，就连亚历山大以其军事天才也未能使自己的成果持久。甚至他个人身上的野性也未能全然祛除。在一次酒宴上，副将克雷塔斯在言语上冲撞了他，他一怒之下竟用长枪将其刺死。<sup>[23]</sup>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3 年因病去世。他一死，他在神谕指导下的非凡冒险精神、军事天才和无与伦比的运气营造起来的帝国便分崩离析。事实上，亚历山大击败波斯帝国并接管整个西亚，<sup>[24]</sup> 其所依靠的主要是希腊人在自相残杀中大大改进了的军事技术和战法，<sup>[25]</sup> 以及他个人的军事才能。可要管理波斯帝国的庞大遗产，希腊人手中的行政理念和制度资源却十分有限。即使亚历山大本人身体力行，并号召希腊人与波斯人通婚以争取后者积极合作，这一缺陷也未得到能弥补。

更严重的是，亚历山大率军东征时，希腊人尚未发展出一种有效平衡内部矛盾以实现更大目标的文明品质。他们太自我中心，注定了在未能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之前，便会发生致命的内讧。但在此时的历史舞台上，西边的罗马人正蠢蠢欲动，即将从希腊世界的边缘崛起，进逼文明的中心。换言之，希腊人刚刚开始扮演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便因缺乏一些重要的品质而被恰恰拥有这些品质的罗马人赶下了历史舞台。希腊人更具个人主义品格，而罗马人则更具社群主义精神。希腊人的个人主义意味着城邦中的个人都尽可能多地从群体索取，都尽可能少地承担的群体生活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正如罗伯特·G·维森所说：“就价值遭受侵蚀而言，追求私利不再受约束，个人主义导致人们不再关心社群，导致人们对公共事物冷漠。在古典时